

Chieftains into Ancestors: Imperial Expansion and Indigenous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 Edited by DAVID FAURE and TS'UI-P'ING HO. Vancouver: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3, 254 pp.

本書是科大衛 (David Faure) 和何翠萍合編的論文集，致力於從地方社會思考中國歷史。全書除科大衛與何翠萍合寫的序言、科大衛寫的導論外，一共由九篇論文組成。

第一篇黃淑莉的論文“*Reciting the Words as Doing the Rite: Language Ideology and Its Social Consequences in the Hmong's *Qhuab Kev* (Showing the Way)*”，用口頭表演理論分析貴州、雲南、四川苗族葬禮中的送魂儀式。黃淑莉認為，作為儀式一部份的送魂經不能被文本化，對它的理解只有放在送魂儀式的表演中才有效。通過對過渡儀式葬禮過程、誦經者和亡魂、參與儀式民眾的分析，作者認為誦經者在整個儀式中同時處理可見世界和不可見世界的關係，在不可見世界中引導亡魂前往祖先之地，創造了可見世界苗人的集體認同。第二篇論文“*Chief, God, or National Hero? Representing Nong Zhigao in Chinese Ethnic Minority Society*”同樣關注儀式。作者高雅寧在廣西地方歷史脈絡裡，討論2005年廣西安德縣儂智高儀式紀念中的多元表徵。儂智高曾於1048年在廣西安德建立南天國，從當時國家的觀點來看，儂智高是邊地的蠻人、造反者和叛徒。1949年以後，儂智高則被認為是對抗越南、保衛宋朝的民族英雄。正是這樣的歷史，使得儂智高在安德縣復興的儀式中同時表徵為南天王、叛亂者和民族英雄，另一方面，由女性儀式專家 Mehmoed 主持的女神——儂智高的妻子或母親——祭祀，給出了不同於當地男性精英（幹部、教師）的意義。在這個女性主導的儀式中，儂智高是安德鎮和六個村落（這六個村落曾經與儂智高一起作戰）的地域保護神。高雅寧對社會結構和儀式中女性價值的關注，在何翠萍的論文中也有進一步討論。第三篇論文“*The Venerable Flying Mountain: Patron Deity on the Border of Hunan and Guizhou*”，作者張應強，討論湖南西南地區和貴州東南部廣泛存在的飛山公信仰，以及當地楊姓人為何追溯飛山太祖楊在思為祖先。楊在思似乎是一位生活於10世紀的地方首領，11世紀，地方的楊姓政治首領投降宋朝，接受國家賜予的頭銜。12世紀時，這一地區出現供奉楊在思的廟宇，將其奉為地方保護神。19世紀早期，祖籍貴州銅仁駐守湖南的軍事將領楊芳創作了楊在思

的故事，通過楊在思有12個兒子的故事情節，將自己追溯為楊在思的第三十一代後人。明清時期，這一地區很多楊姓土司都利用此故事，宣稱自己是楊在思的第十個或第十二個兒子。另一篇題為“*Surviving Conquest in Dali: Chiefs, Deities, and Ancestors*”的論文中，連瑞枝根據大理趙氏的口頭傳說和書寫譜系討論從地方神祇到祖先崇拜的演變。大理建峰趙氏祖先趙康曾被大理國王盛閣坡奉為外祖，封為五峰山山神。1409年，當地一個儀式專家根據趙康的故事寫了一篇文章，使其成為龍關、喜洲和塔橋三支趙氏的祖先。連瑞枝分析這三支趙氏的族譜，發現三支趙氏的祖先都是大理國的官員或薩滿，隨着明代對雲南的控制日益增強，他們的後代需要尋求維持家族社會地位的新方法。1500年科舉考試在雲南推行以後，越來越多的趙氏後人通過考取功名取得了受國家權威認可的新社會地位，趙氏族譜開始呈現漢人風格，把他們的祖先起源追溯至南京。謝曉輝的論文“*From Woman's Fertility to Masculine Authority: The Story of the White Emperor Heavenly Kings in Western Hunan*”，結合清代佔領湘西的歷史，研究白帝天王的傳說與儀式。作者發現天王及其母親起初只是湘西人崇奉的眾多神祇之一，反映的是湘西人對他們生活地域「九溪十八谷」的認知，隨着國家向湘西的拓展，臣服於楊姓土官的土著重新調整自己的社會關係，認可他們是播州土司收養的楊家將後代。清代為了整合湘西地區，將天王祭祀列入春秋祀典，認可天王姓楊，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白帝天王既是神明也是祖先。同時，湘西人逐漸接受了單系的父系世系。另一篇論文“*The Past Tells It Differently: The Myth of Native Subjugation in the Creation of Lineage Society in South China*”中，賀喜講述了歷史人物冼夫人和馮寶成為神明繼而成為祖先的故事。高梁冼夫人和丈夫馮寶是支持陳朝、隋和唐的歷史人物。到了明代，高梁故地的人建冼夫人廟將二人奉為神明，平息太平天國起義之後，清政府為了重建廣東的秩序，認可冼夫人廟，同時認定長坡馮氏為馮寶後人，負責祭祀冼夫人廟。在這個過程中，廣東、廣西、海南的馮氏都將自己的祖先追溯至冼夫人和馮寶。

科大衛的論文“*The Tusi That Never Was: Find an Ancestor, Connect to the State*”講述了廣西歸順岑氏土司後人如何將自己的歷史追溯至一個漢人。1731年阿勒泰改土歸流，結束了岑氏土司在廣西西部的歷史。但是1848年的歸順地方歷史記載，歸順岑土司曾由張姓男子襲承，其祖先為張天宗，地方還流傳着張天宗如何追隨文天祥逃到廣西，成為峒主，修建學校，供奉社神等等的故事。甚至，歸順地方還有一個埋葬張天宗、張氏後人和岑姓後

人的墓地。科大衛的研究發現，張天宗是通過扶乩書寫自己歷史的一位人物，他從南宋逃到廣西定居的歷史並不可靠，其中包含的權威來自國家、父子世系、漢字學校等因素，可能表示這是一個地方土著從國家角度講述的故事。故事中父子相繼譜系的出現、張氏家族墓地的創造，可能反映的是歸順土著居民將自己的起源追溯至漢人。魏捷茲 (James Wilkerson) 的 “The Wancheng Native Officialdom: Social 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 研究廣西萬承1868年的一塊石碑，結合廣西司法、稅收和教育的歷史，討論地方社會結構如何再生產及結構轉變的過程。通過勞役分配，萬承形成了官、客、目、民、番的結構，通過同姓不婚和階層內婚，社會結構得以再生產。隨着國家對廣西司法、稅收政策的變化以及科舉考試的推行，地方社會越來越趨近於流官系統管理和有功名的文人構成的社會階層。最後一篇是何翠萍從性別角度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儀式的論文，題為 “Gendering Ritual Community across the Chinese Southwest Borderland”。作者認為在地方社會遭遇國家的過程中，新的女性性別觀念、女性邊緣化的政治作用和地位被生產出來。何翠萍通過分析大理王室和湘西白帝天王的傳說、安德儂智高紀念儀式、瓊山梁沙婆和塘龍石洞苗土地菩薩祭祀，認為這些神祇傳說反映的是地方社會建立國家和處理未知（未知既包括外部的陌生人，也包括入侵者）的能力，並認為西南地區女性神祇在這些儀式中具有非受孕生育和受孕生育的雙重性質。與消除性別差別強調男性家庭內部生殖力不同，在西南少數族群（如壯族）的人觀中，強調女性是外部來源的再生產力量，強調女性的受孕生產。女性神祇的雙重性質，是地方和國家在歷史結構並接中「性別談判」(gender negotiation)的結果。另一方面，人們利用女性的再生產力量，在儀式中創造了地方社會的歷史意識。因此，安德人利用女性神祇建構了儂智高「王國」的地域祭祀群體，創造或復活了歷史上逝去的「儂智高王國」；大理流傳的觀音背巨石抵禦入侵者的故事，創造了想像的「白國」。

以王朝為中心的傳統歷史書寫方式，向來關注中國文化向邊地擴散，邊地社會從「蠻荒」到被「禮儀」化，國家文化的一體性在這樣的敘述中被創造出來。然而，地方社會在這樣的歷史敘事中失聲。正如科大衛在導論中指出的，廣西、貴州、雲南以及湖南的一部份地區，在元代以前，有着不同於中國的語言、宗教、政權和社會結構。17、18世紀，清代建立了嚴格的管理秩序，很多土官管理的地區都經歷了改土歸流。在這樣的歷史中，地方社會在語言、宗教、政權等方面與國家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雜糅，創造性地將國家的文化邏輯內化。中國西南少數族群的邊疆地區大多沒有父系譜系和父系

祖先祭祀，隨着國家力量的進入，地方社會或是為了尋找新的權威來源，或是為了適應新的社會狀況，從土司、地方神祇等層面開始出現一個父子相繼的譜系，在此意義上，本書的作者們呈現了土酋到祖先的演變和地方社會的轉變，呈現了地方內化國家文化邏輯的過程。然而，無論是內化國家文化邏輯還是地方社會轉變，都尚未湮沒地方社會主體性，就像高雅寧和何翠萍所呈現的，女性及其所象徵的再生產力量，在當代述說着地方的歷史，對國家、對「大歷史」的理解，再生產了地方社會的歷史意識。

胡冬雯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

章毅，《理學、士紳和宗族：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3年，257頁。

章毅的博士論文《理學、士紳和宗族：宋明時期徽州的文化與社會》曾榮獲2006年度「香港中文大學青年學人論文獎」，經過作者數年精益求精的修改，終於在近期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選擇了一個極富挑戰性的區域和論題作為研究的對象。不論是理學、宗族還是徽州，都是學界研究積累深厚的領域。但作者無疑用一種新的史學理念在這個領域完成了一項具有獨創性的工作。在本書的序論部份，作者用簡潔的語言做了很好的學術史的梳理。他將以往的徽州宗族研究歸納為三種論述的線索。在我看來，前兩條論述的線索是一致的，即從所謂「核心人群」（徽商、士紳或者「士紳化」的商人）的角度來解釋宗族的產生、作用和影響。而第三種論述線索，則是從地方「信仰」演變的角度探討宗族力量上升並逐漸佔據「正統」地位的過程。這兩種解釋的路徑其實並不互相排斥：後者的演變必須是通過前者「核心人群」的活動才得以實現的。問題是，這些「核心人群」並非是一個凝固不變的群體，他們在一個區域中的出現、興起、演化和興替，同樣是歷史的過程。如何在這些人群的活動中，去展現徽州從一個化外之地成為宗族社會、禮教之邦的過程，大概就是這本書的核心內容。在這一思路之下，問題就不再僅僅是：「核心人群」如何製造了宗族？而是：「核心人群」是如何出現、興替的？製造「宗族」在他們的活動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這樣的提問方式，勢必要將研究的時段拉長，